

青少年偶像崇拜系列综述之五：

论百年来中国大陆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变迁

岳晓东 梁 潇

摘要：本文探讨了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演变历程。笔者首先提出，偶像崇拜在神灵性—世俗性、精英性—草根性、禁欲性—享乐性三个维度上存在着内在的对立关系，并以此将偶像崇拜分为神灵性偶像崇拜、民俗性偶像崇拜、圣贤性偶像崇拜、娱乐性偶像崇拜和草根性偶像崇拜五种类型。以这五种类型为基础，笔者提出，中国大陆青少年偶像崇拜经历了幼稚多元化阶段、相对单一化阶段、绝对单一化阶段、探索多元化阶段和成熟多元化五个阶段。其结果是偶像崇拜逐渐由幼稚多元化走向成熟多元化，由激进走向理性，由迷恋西方价值观走向确立独立的价值观。最后，本文也总结了研究当前中国社会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偶像崇拜 中国大陆 青少年

一、前言

(一)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意义

心理学认为，偶像崇拜是个人对其喜好人物的社会认同和情感依恋。弗洛伊德(Freud, 1925)认为偶像崇拜是青少年性发展的标准方向，因为青少年增强的欲望行动不能只指向父母及同辈人，也需指向像偶像这类较远的人。弗洛姆(Fromm, 1967)认为偶像崇拜是一种对幻想中杰出人物的依恋，这种幻想常被过分地强化或理想化了。埃里克森(Erikson, 1968)将偶像崇拜理解为个体将儿童时期对父母的养育式依恋转移到青少年时期对异性的浪漫式依恋的一种表现。

个体出生后，就开始了其社会化的过程。内地学者李海荣(1998)提出，人格的社会化大体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人格偶像崇拜阶段，第二人格偶像阶段以及独立人格阶段。对独立人格影响最直接、最早、最深远的是第一人格偶像崇拜。宋兴川和金盛华(2002:1-7)对于青少年偶像崇拜对于青少年人格发展的意义进行了进一步阐述，他们认为第一人格偶像，即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双亲，其心理和行为范式在学前期子女的心目形成了人格楷模。而到了青春期，青少年开始脱离父母的限制，在追求和实现独立的社会性行为时，选择和确立新的偶像，新的偶像又称为第二人格偶像。对于青少年的这种偶像崇拜行为，笔者认为它满足了青少年对于遥亲感(Remote intimacy)的需求(岳晓东, 1999b:27-51)。

就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变化而言，偶像崇拜可以是青少年自我确认的重要手段。青少年需要从对不同杰出人物的认同和依恋中肯定自我的价值(Blos, 1967 ;Josselson , 1991)。青少年从自我迷茫和自我确认的拖延状态中走出来，时常需要经历一些冒险，也不接受任何说教和过早的自我确认(Marcia , 1980)。在这当中，对一些成年或同龄的偶像认同可使青少年寻求更高的价值，并为其进入成年角色做好准备(Erikson , 1964/1968)。

(二)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变迁

青少年偶像崇拜，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显示出一个时代的烙印。偶像崇拜的变迁，不仅反映出人们思想行为的变化，也折射出社会时代的转变(岳晓东, 1999a:1-9)。

所谓社会变迁就是指文化类型、社会结构与社会行为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社会文化的静态

和稳定性是相对的,而变迁才是社会常态,社会变迁体现出了社会发展演变的有机状态。由于宏观的社会与微观的个体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对于社会变迁问题的研究,自然地形成了两种视角,分别具有不同的研究意义:(1)以宏观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的变迁为理论模型,演绎式地分析微观社会事件和个体心理的变化原因;(2)以微观社会事件和个体心理的变化为素材,归纳式地反映社会其它微观方面以及宏观整体的状态和规律。

由此,对于社会变迁与青少年心理的研究,也多在这两种视角下展开。第一种视角的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把握青少年心理发展变化的特点、影响因素、应对方式,从而更有效的提出干预策略。第二类视角的研究则可以帮助研究者构建社会变迁的理论模型,从而更好的对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的趋势进行预测。

青少年偶像崇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与社会文化紧密相关。众多内地学者都曾关注过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变迁(周国文,2002:26-29;岳晓东、严飞,2007:1-8;李茂,2007:26-28)。本文将选取第二种视角,对不同时代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进行述评,并试图从其内部特性的联系和变化出发,归纳青少年偶像崇拜变迁的模式。

二、中国大陆偶像崇拜变迁的历程

(一)概述

中国社会从来就不缺少偶像崇拜。在“五四”之前,是对孔子等儒家文化代表人物的圣人崇拜,也有对苏东坡、韩愈等文学代表人物的文人崇拜。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崇拜,即以对伟大人物的人格、道德与学问等的修养所产生的权威慑服后代的崇拜,当然其中不免有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所造成的盲目崇拜甚至迷信神化的成份。随着认识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人的理性力量逐步被现实证实,理性征服了自然力,人类不靠神灵和权威,只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就能创造一个光辉的现实世界,于是,宗教崇拜与圣人崇拜发展到理性崇拜。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偶像仍然代表着统治的权威。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打破偶像,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潮流。宗教崇拜以及宗教式的圣人崇拜被质疑和推翻,但新的偶像并没有树立起来。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种偶像崇拜文化的缺失才得到了改善。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新偶像开始注重草根性和相对性,然而很快地这些草根出身的人物被政治宣传精英化,其代表如董存瑞、雷锋、王进喜^①等人,这一现象也反映出了当时中国国民偶像崇拜文化的不成熟。在这四五十年中,从社会道德的楷模到个人爱慕的对象,从学习其精神到模仿其造型,从全民崇拜到一盘散沙,偶像从神坛跌落到了人间,也在某种意义上从精神落实到了实际。但无论如何,偶像都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广为人知,并成为许多人效仿的对象,他们的某种特质曾经或正在影响着这个社会的无数人,人们以疯狂或理性的方式喜爱、学习、怀念他们。偶像伴随着一代代的人成长,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雷锋、陈景润^②、邓丽君^③,到80年代的张海迪^④、北岛^⑤、三毛^⑥……这些名字已经成为不同时代难以磨灭的记忆。回顾中国社会近半个世纪以来

① 王进喜(1923~1970)外号“铁人”,大庆油田建设过程中的劳动模范。

② 陈景润(1933~1996),中国著名数学家,长期致力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

③ 邓丽君(1953~1995),本名邓丽筠,20世纪后半叶最富盛名的华语和日语女歌手之一,曾以柔情歌曲风靡华人世界。

④ 张海迪(1955~),五岁时因患脊髓血管瘤,高位截瘫。以顽强的意志克服疾病,自学医术并进行文学创作,被称为“八十年代新雷锋”和“当代保尔”。

⑤ 北岛(1949~),原名赵振开,中国著名诗人。著有诗集《北岛诗选》、《太阳城札记》、《北岛与顾城诗选》,中短篇小说集《波动》,译著诗集《现代北欧诗选》,散文集《失败之书》、《时间的玫瑰》。

⑥ 三毛(1943~1991),原名、又名陈平,中国台湾著名女作家,著有《撒哈拉的故事》、《滚滚红尘》等。

偶像的变迁,我们能够看到其中所折射的时代文化的巨大变化。

下面将详细论述自 20 世纪初以来,中国大陆的偶像崇拜的变迁。

(二)中国大陆青少年偶像崇拜变迁的讨论方法

偶像崇拜的三个特性维度和五种主要类型。根据多年的研究,笔者在此提出偶像崇拜在神秘性(mysticism)——世俗性(mundanism)、精英性(elitism)——草根性(commonerism)、禁欲性(asceticism)——享乐性(hedonism)这三个维度上存在着内在的对立关系,构成了偶像崇拜内涵的正六边形模型(岳晓东、梁潇,2009:53-59)。通过三个维度——六种特性的划分,笔者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大陆青少年偶像崇拜的五种类型,即:宗教性偶像崇拜(Religious idolatry),民俗性偶像崇拜(Ethnic idolatry),圣贤性偶像崇拜(Sage/Luminary idolatry),娱乐性偶像(Recreational idolatry),草根性偶像崇拜(Grass-roots idolatry)。这五种不同类型的偶像崇拜在六种内在特性上既有互相重叠和依赖的部分,同时又各具特点(岳晓东、梁潇,2009:53-59)。

以往对于中国大陆青少年偶像崇拜变迁的研究有着明显的同质化,即单纯的描述每个时代偶像崇拜的主要对象,而对其内在联系和演变规律鲜有论述。本文所归纳的五种偶像崇拜类型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于不同年代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同时由于五个类型之间存在三个维度的内在联系,使得长时间跨度下的偶像崇拜的变迁能够获得整体性的审视。

本文即以五种偶像崇拜类型在中国大陆的不同历史时期中的消长变化为核心,以述评方式对 20 世纪初至 21 世纪初的中国大陆青少年偶像崇拜的趋势进行了讨论。

(三)中国大陆偶像崇拜变迁的具体分段

1. 民国时期(1911年-1949年):幼稚多元化崇拜阶段

幼稚多元化崇拜阶段(primitive diversification period),指的是偶像崇拜对象的选择有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但是偶像崇拜的总量低、强度弱,难以形成稳定的社会文化。民国时期的偶像崇拜所呈现的正是这一特点。1911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但是,思想解放的运动在数千年的封建传统之下,面临着极大的阻力。当时中国人的偶像崇拜仍然以宗教性偶像崇拜和圣贤性偶像崇拜为主。在独尊儒术的封建社会格局下,人的偶像追求也仍然是自我的圣化,即通过自我修养和完善,成为圣人、贤人、君子、仁人(周永生,1994:10-15)。在这一追求过程中,圣贤性偶像就成为了被模仿的对象。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及其文化价值的渗透,中国人的偶像崇拜价值出现了根本性的动摇。西方社会的民主、人权思想也启蒙了一批中国的文化精英。如在 1918 年 8 月 15 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上发表《偶像破坏论》,文章谈到“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与此同时,李大钊也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号召青年人解放思想,破除偶像崇拜,“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路径,创造一种新生活。”随之而来的正是一场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运动的核心之一即是推翻偶像崇拜,即当时社会中处于主流的宗教性偶像崇拜和圣贤性偶像崇拜。从 1915 年 9 月到 1921 年间,《新青年》杂志展开了批判孔子思想和孔教的攻势。以陈独秀、吴虞代表的此一反传统举动,被称为是一场对“儒学的歼灭战”(孙玉石,1999:30-36)。

由此,笔者将这一时期的偶像崇拜归纳为“幼稚型多元化”。可以说,过度集中的圣贤性偶像崇拜的推翻,给偶像崇拜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比如,在这一时期,娱乐性偶像崇拜和民俗性偶像崇拜均有一定的兴起,京剧名伶与思想大师等都受到大批不同阶层国民的追捧。例如,内地学者周永生(1994)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英雄们思想意识观念的多重性及不一致性,造就了五四先驱者及后人的多重英雄群体和个体。”内地学者钱理群(1994:10-15)也指出:“五四的先驱者奉行的是‘兼收并蓄’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正价值正是在于它所提供的多种可能性。”

然而,这个时期偶像崇拜的多元化也是幼稚而脆弱的,对某种形式的偶像崇拜不加区别的批判导致了偶像崇拜文化总体上的疲软。对新文化运动报以反思态度的学者认为“五四运动”的缺点:“一是在批判传统时,缺乏公正与同情,忽视作家和民族传统的良好方面;二是对于新观念过于轻信,而又不免混乱模糊;三是他们对于复杂问题过于性急。”也有学者认为:“五四的错误,不在反传统,而在于它未能建立起接受西方文化的正确态度,即是有破而无立”(赵春暘,1989:93-96)。

依笔者之见,由于新文化运动对于偶像崇拜的态度激进,并未对偶像崇拜的积极与消极方面进行区分,导致偶像崇拜受到了过分的破坏和打压,而积极的多元的偶像崇拜并未得到良好的发展。这一问题的形成与民国时期动荡的局势有关,同时也被当时社会文化的混乱局面所掩盖,使得问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才逐渐显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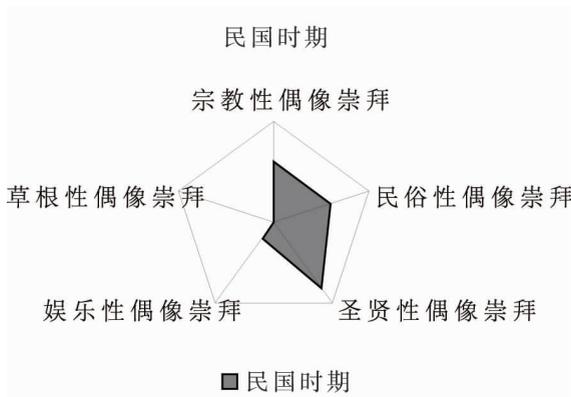


图1 民国时期——幼稚多元化崇拜模式图

2. 过渡重建时期(1949年-1966年):相对单一化偶像崇拜阶段

相对单一化崇拜阶段(relative unification period),指的是倡导偶像崇拜的多元化是社会的主流意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多元化逐渐产生了转向单一化的某种退行性改变的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到民国时期砸烂偶像思想的影响,偶像崇拜从意识上到行为上都处于较低的水平。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对偶像崇拜的鼓励和引导。鉴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国大陆建立了一套高度政治化、组织化的社会运行机制。随着建设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思想的不断宣传,偶像崇拜的对象受到政治宣传影响的专一性开始显现,偶像崇拜的对象主要以政治宣传为主,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中各行业的杰出人物,如焦裕禄^①、雷锋、王进喜等等。他们与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杨靖宇^②、董存瑞,朝鲜战场上的黄继光^③等组成了一个甘于自我牺牲,具有突出奉献精神的新时代英雄群体。作为偶像人物,他们都具有禁欲性、世俗性的特点,并且被强大的政治宣传精英化。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以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号召的偶像年代。艰苦朴素、舍己为人、自力更生、献身国家是这一时期偶像的共同特征,突出反映了中国早期建设者的共同优秀品质。他们身上无私奉献、为国家牺牲小我、艰苦奋斗的精神感动了几代人,成为几代中国人学习的榜样,并成为那个历史时代的标志。这个时期也是圣贤性偶像的“黄金时代”,每一个偶像的出现都会造成全民性的影响,其普及程度是后来的偶像们所不能企及的。它的盛况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全国人民都在“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的感召下投身国家建设的洪流,年轻人都以研读《雷锋日记》、《钢铁是

① 焦裕禄(1922~1964),曾任河南兰考县县委书记,以无私奉献的苦干精神成为中国基层干部的楷模。

② 杨靖宇(1905~1940),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民族英雄,鄂豫皖苏区及其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③ 黄继光(1930年~1952),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烈士。

怎样炼成的》为豪。而对于这些偶像的崇拜,都可称之为英雄崇拜或榜样崇拜(岳晓东,1999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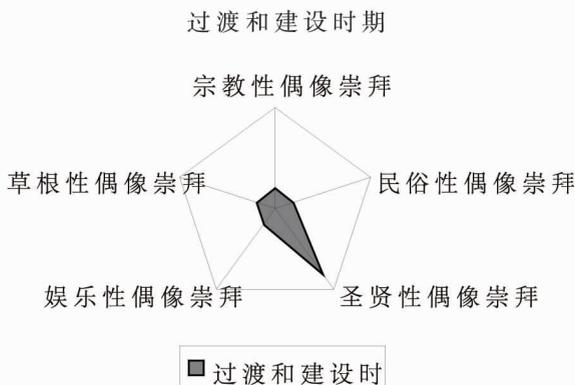


图2 过渡和建设时期——相对性单一化崇拜模式图

3.“文革”时期(1966年-1976年):绝对单一化崇拜阶段

绝对单一化崇拜阶段(absolute unification period),指的是文革时期中国大陆偶像崇拜高度地集中于圣贤性偶像,可以说是一种向封建思想的退行性变化。同时,退行导致的幼稚化使得这种单一的偶像崇拜极为脆弱,经常要依赖于个人崇拜的形式来维系,一旦个人崇拜的热潮退去,对圣贤偶像的质疑随之而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无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都经历了缺乏经验的探索阶段。同样的,偶像崇拜的发展也经历了被政府高度引导的时期。到六十年代中后期,由政治宣传为信息传播途径的偶像崇拜呈现出高度的专一性,偶像崇拜的对象高度集中于对创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政治精英,他们被奉为救世主,成为这一时期的圣贤。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时期的圣贤性偶像崇拜是偶像崇拜低水平发展背景下的历史倒退。

正如关注“毛泽东崇拜”现象的内地学者何宇宏所言:“对毛泽东的崇拜心理的产生是由于中国民众对‘圣贤天子’、‘青天老爷’向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偏爱和期待。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他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①,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的”(何宇红,1994:105-111)。毛泽东以其巨大的个人魅力和卓著功勋赢得了极端的权威,人民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把他当作圣人来敬奉和歌颂。这是因为在青少年时期,人的心理和人格尚未形成,并渴望得到成人的认同,也容易受政治社会环境的影响。由此,他们不仅具有浪漫情怀而且更渴望献身正义,充满激情却又极易走向极端,有独立反叛的倾向又极易模仿和盲从冲动。因此,由于偶像崇拜信息的单一性,当时的青少年只能以少数政治人物填补人格成长过程中的空虚。

4. 改革开放二十年(1979年-1999年):探索型多元化崇拜阶段

探索型多元化崇拜阶段(explorative diversification period),指的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偶像崇拜一方面以多元化为发展的根本目的,一方面又因为经验不足而容易误入歧途,这种多元化模式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不够稳定。进入八十年代后,中国大陆偶像崇拜开始呈现多元化,其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民俗性偶像崇拜与圣贤性偶像崇拜的保留;娱乐性偶像崇拜的兴盛;宗教性偶像崇拜的复苏(Yue & Cheung, 2000:91-98)。七十年代末期,文革宣告结束,高度集中的圣贤性偶像崇拜再一次被打倒,偶像崇拜再一次陷入真空期。但是与建国初期不同的是,改革开放思想弱化了政府对于偶像崇拜的引导,偶像崇拜对象的选择实现了初步的自由化。

从八十年代起到九十年代末,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开放和国门的慢慢打开,社会元素由同质单

^① 三座大山: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革命对象,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好比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旧中国人民的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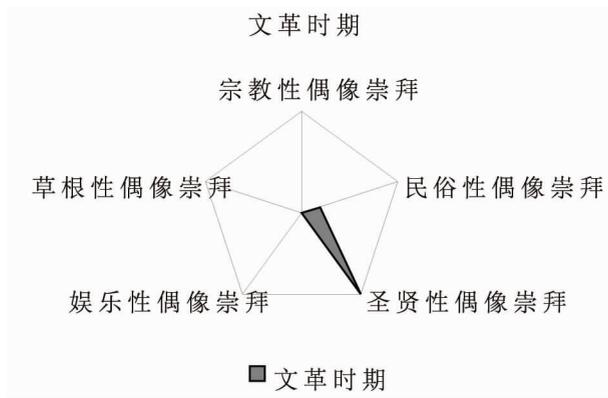


图3 文革时——绝对性单一化崇拜模式图

一性向异质多样性转型，人们对偶像的选择也由过去的被动接受向自主追求转变。这一时期每个偶像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往往是“各领风骚两三年”，变换非常迅速。内地学者宋兴川所引用的数据显示，1982年中学生最崇拜的人物是马克思^①、毛泽东和周恩来；1985年和1988年，中学生的崇拜偶像变成福尔摩斯^②、爱因斯坦^③、超人、林肯^④、里根^⑤、007^⑥、武则天^⑦、刘晓庆^⑧、贝利^⑨等；1991年，偶像名单里出现了谭咏麟^⑩等港台歌星、席慕荣^⑪等港台作家（宋兴川、金盛华，2002）。

八十年代的“偶像”概念较文革时期变得更加宽泛：它打破了单一的圣贤性偶像崇拜，也越出了传统学习型偶像的范围，增加了爱慕型的偶像。还有一种说法是，过去的英雄人物是生产型偶像，而现在出现了消费型的偶像——娱乐明星。另外一个特征是，偶像的作用不再像昔日那样一呼百应，全民崇拜。从这一时期开始，偶像已经走向多元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娱乐性偶像崇拜开始在中国大陆风行一时，三星崇拜成为了这一时期偶像崇拜的核心（岳晓东、严飞，2007：1-8）。在满足了物质生活的需求之后，世俗化、大众化的文化消费取代了过去有思想深度的文化形式。这一时期的偶像主要是来自港台的娱乐明星，而广播、电视等传媒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另一种趋向则是对实用型偶像的崇拜。在实用主义泛滥的九十年代，说自己崇拜比尔·盖茨的人比比皆是。对于成功、财富的向往使一大批知识英雄、企业家成为青年的新偶像，而对他们的崇拜，可统称为杰出人物崇拜（岳晓东、张宙桥，2002：133-145）。

5. 二十一世纪（2000年-今）：成熟多元化崇拜阶段

成熟型多元化崇拜阶段（mature diversification period）用以描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陆偶像崇拜，表示其多元化发展已经开始进入理性的、稳定的阶段，具有着向理想型的成熟和完善状态发展的良好趋势。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科技的不断发达，特别是网络的普及以及播客、博客的流行，整个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流行文化的发展已经由以前那种从上到下的传播方向被颠覆成了更加发散的

① 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

② 福尔摩斯：夏洛克·福尔摩斯是英国小说家阿瑟·柯南·道尔所创造出的侦探人物。

③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著名的德裔美国科学家，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④ 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美国政治家，第十六任总统，也是首位共和党籍总统。

⑤ 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 1911~2004），美国第四十任总统。

⑥ 007：英国系列电影中的英雄人物。

⑦ 武则天（624~705），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国号大周。

⑧ 刘晓庆（1951~），中国著名影视女演员。

⑨ 贝利（Edson Arantes do Nascimento, 1940~），巴西著名足球运动员，被誉为世界“球王”。

⑩ 谭咏麟（1950~），中国香港著名歌星。

⑪ 席慕容（1943~），中国台湾著名女诗人、散文家、画家。代表作有《一个开花的树》、《七里香》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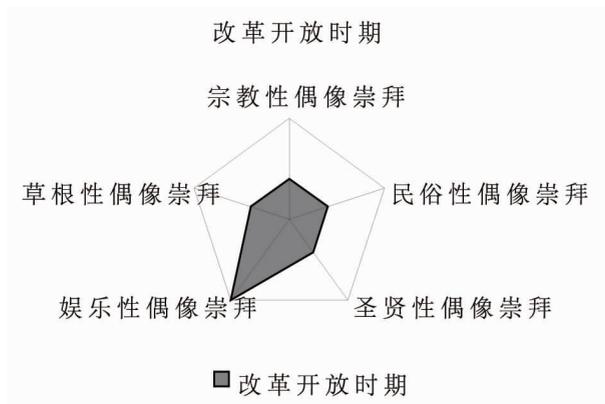


图4 改革开放时期——探索型多元化崇拜模式图

模式,人类的偶像崇拜也因此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偶像崇拜越来越成为人类自我意识的产物,也越来越变得情绪化、平民化和生活化,偶像崇拜的现代形式,更加凸显出多元化和个体化。内地学者周国文指出,在现代青少年的社会生活中英雄榜样的地位逐渐弱化,明星偶像的作用凸现出来,单一化的榜样已经让位于多元化的偶像,并且更多地体现出了一种自由的意志。意识形态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以一种强迫的方式逼使大众接受,只能在竞争中通过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征服大众。过去意识形态的压力在当今社会已经通过大众文化逐步化解最终成为个人的事情(周国文,2002:26-29)。内地学者2006年对中学生偶像崇拜的调查显示,这一时期青少年偶像选择的顺序为:明星、超女、杰出人物、政治人物、父母、自己、媒介及IT从业人员、虚拟人物、亲属、老师、其他和同学(章洁等,2006:26-27)。笔者认为,其中出现的超女、自己、以及虚拟人物代表了网络传媒影响下的以个体意识觉醒和主动参与为特征的偶像崇拜新类型,即草根性偶像崇拜,非常值得注意。

在“草根文化”兴起的时代,2005年夏天席卷全中国并且入选2005年度中国流行文化十大关键词的“超级女声”节目将平民偶像崇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超级女声”节目是中国湖南卫视主办的大众歌手选秀赛。在网络、电视、手机等媒介的推动下,凭借着“想唱就唱,唱的精彩”的口号,超级女声成为了流行文化的一种符号象征,代表着一种时尚潮流,喜欢追赶时髦的青少年甚至中老年人不约而同一哄而上,使超级女声成为青少年流行文化的一大现象。在“超女崇拜”中,普通百姓可以选择崇拜,也可以不崇拜,甚至可以对这类崇拜提出批评;他们还可以今天崇拜某一个对象,改日转而崇拜其他对象,不管他们的选择如何,都不会受到强制性的束缚。

另一方面,除了对成功的聚焦以外,因网络在社会生活中的普及和深入而迅速蹿红的一批“另类偶像”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芙蓉姐姐^①、孔庆祥^②等成为这类偶像的代表人物。几乎每一个人都有着与生俱来的明星梦,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明星梦得以通过“自助”的方式来完成,从而让“人人都能成为偶像”的说法在理论上变得可能。这其中的佼佼者通过网络和电视等媒体的推动,完成了一场麻雀变凤凰的神话。同时,其他类型的偶像崇拜也在二十一世纪获得了发展。传统文化中的圣贤重新得到了尊重;“三星”崇拜依然兴盛但趋于理性;宗教自由的政策给予了宗教性偶像

① 芙蓉姐姐(1977~),原名不详,由于其经常在网上贴自己的照片,造型另类夸张,成为了网络上人气火爆的紅人,被称呼为芙蓉姐姐。

② 孔庆祥(1982~),美籍华裔,在2004年美国选秀节目《美国偶像》唱Ricky Martin名曲《She Bangs》被判说不能唱、不能跳舞。他响应自己已经尽力而无悔,由此成名。

崇拜以拓展的空间；大学教授这一象牙塔中的文化精英群体也走入大众视野，易中天^①、于丹^②等学者也拥有了大批“粉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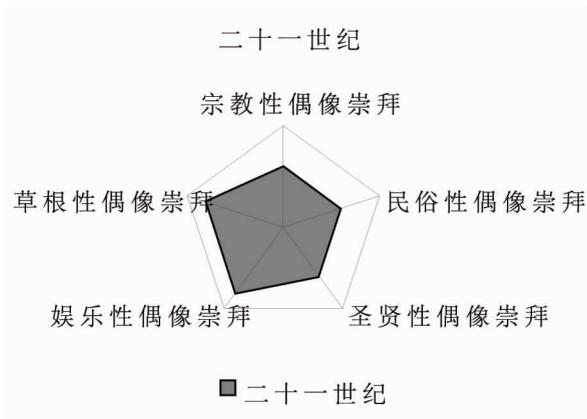


图5 二十一世纪——成熟型多元化崇拜模式图

三、大陆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整体趋势

综上所述，偶像崇拜在中国百年来历史上的变迁，总体上呈现出两大特点：第一，偶像崇拜的对象范围在扩展；第二，偶像崇拜对象的构成模式趋向平衡稳定。具体而言，中国大陆青少年偶像崇拜呈现出三种趋势：(1)由幼稚多元化走向成熟多元化；(2)由激进走向理性；(3)由迷恋西方价值观走向确立独立的价值观。

(1) 由幼稚多元化走向成熟多元化

以往关于青少年偶像崇拜变迁的研究，多着眼于文革到改革开放这一历史阶段。其间，青少年偶像崇拜显示出明显的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内地学者曾经对此进行过详细的阐述(罗丽榕,2007)，印证了笔者对于绝对单一化偶像崇拜到探索型多元化偶像崇拜的论述。而通过对于近一百年来这一更长的历史跨度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青少年偶像崇拜实际上有过多元化的阶段，其总体趋势是幼稚型多元——单一化倒退——多元化探索——成熟型多元的螺旋式发展。

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变迁反映出我国社会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对此，内地学者曾经给予了较多关注。社会文化的单一化固然是受到广泛的否定，例如“文革”时期，社会的文化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亚文化受到了压抑、遭致弱化和排斥(罗丽榕,2007:124-126)。而对于探索期的多元化偶像崇拜，诸多研究者也抱有审慎的态度。有内地学者认为精英主义者会担心流行文化，特别是“明星崇拜”的价值观会导致社会文化走向低俗(罗丽榕,2007)。也有内地学者认为，统一化的榜样让位于多元化的偶像，会令“偶像越来越变得无序化，多样化的选择使现代青年健康价值观的确立更为困难”(周国文,2002:26-29)。

而通过对二十一世纪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的观察，我们可以注意到草根型偶像崇拜的崛起，以及多种类型偶像崇拜的均衡发展。由此，笔者认为，中国社会文化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对于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探索和反思，越来越有着稳定和成熟的认识，而并非走向混乱的原点。

(2) 由激进走向理性

① 易中天(1947~)，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文学、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2005年起开始在CCTV-10《百家讲坛》节目里讲解三国历史。

② 于丹(1965~)，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因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授“《论语》心得”而闻名。

从民国时期直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陆,圣贤性偶像所代表的权威力量始终压抑着民众自主意识的表达,而民俗性偶像也在强大的政治宣传背景下成为圣贤性偶像的附庸。因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大陆偶像崇拜始终缺乏理性,无论是树立还是打倒,都带有强烈的激进性与盲目性。

八十年代是一个复苏的时代,青年们回到城市,从头开始,他们需要奋斗精神的鼓舞。传统的圣贤性偶像和民俗性偶像在这一时期受到了质疑,而平民中的社会道德楷模,如身残志坚的张海迪、救火牺牲的少年英雄赖宁,以他们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继续成为大众景仰和学习的对象。此外,在体育界,中国女排以五连冠为中国人找回了自信和骄傲,成为万众仰慕的焦点;在文学界,顾城、北岛、舒婷等诗人以及来自港台的金庸、琼瑶成为青少年热切追逐的目标。港台娱乐明星也在这一时期大量涌入内地,使国人形成了早期的明星崇拜。1984年10月1日,35周年国庆首都群众游行时,北京大学游行队伍行进中突然展开一条“小平您好”的横幅,这一举动也象征着政治偶像走下了神坛,成为大众可以亲近的对象。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一方面,草根性偶像崇拜的崛起展现出了中国民众自我意识的苏醒。对平民偶像和另类偶像的崇拜表达了民众反精英、反智慧、反美学的追求平等自由的思想。在这场草根阶层的文化盛宴中,真正主导的是平民大众。这表明在偶像崇拜中,更加迁就个人经验的文化已经上升为一种新的文化主导要素。中学生开始有意识地从“近处”、“身边”寻找模仿源,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理性化倾向(闵丽,2003:9-14)。

另一方面,中国人也开始向传统概念中的圣贤偶像表达了平等的和亲密的感情,表现出了理性和自信的姿态。2008年4月19日,巴黎的中国留学生打出了“胡哥加油”的标语问候国家主席胡锦涛。2009年2月2日,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向温家宝总理展示了“我爱宝宝”的条幅。偶像崇拜走向现实化、理性化、相对化,标志着中国大陆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成熟。

(3) 由迷恋西方价值观走向确立独立的价值观

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推翻了传统偶像崇拜。但是,文化精英主导的社会文化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从西方照搬的新文化缺乏广大民众的接纳和支持,幼稚型多元偶像崇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中国人在民族文化上的迷茫。

新中国建立后直至文革结束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大陆强调意识形态的差异,一味抵制西方思想文化。在偶像崇拜上,青少年一方面对于港、台与西方的歌星、影星、政界名人怀有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却又怀疑这些偶像的存在价值。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青年的偶像崇拜文化重新开始探索多元化的发展模式。与民国时期的单向性接纳不同,此时开始的真正的开放具有双向性的内涵,即一方面引入西方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将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向世界输出。对中国传统的民俗性偶像和圣人崇拜的复兴,展现了开放带给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近年来,祭祀孔子、妈祖等活动不但吸引了广大海外华人,也开始受到西方人的关注。中国大陆的青少年在偶像崇拜上的参与度不断增强,体现了独特的价值。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大众化选秀活动为例,其所反映出的草根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受到西方媒体的热切关注。

四、结语

本文通过回顾百年来中国大陆偶像崇拜的变迁,以笔者曾经提出的五种偶像崇拜类型的消长为内在线索,归纳了中国青少年偶像崇拜“螺旋式的多元化发展,理性化进步以及价值观的本土化与自主化”的三大趋势。值得提出的是,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仅为基于有限历史资料的定性式推论,仍需要日后更加严密的实证研究的支持。

从社会变迁过程的某一个侧面出发,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结构体系中的所有要素,都以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具体地、历史地表现社会变迁,使社会变迁成为相互作用的结果”(黄陵东,2003:74-78)。过去的一百年,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之中,经历了一系列

的社会剧变。在这一系列剧变之中,青少年是最具活力、最为敏感的群体,是社会文化趋势的最灵敏的指示剂。因此,研究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的变迁,即可以从一个侧面把握这一群体的思想状况和精神世界,进而则可以看出其中所折射出的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把握过往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未来社会的走向(张大均、吴明霞,2004:27-31;罗丽榕,2007)。

总而言之,当代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变迁仍然存在令人担忧的部分。有内地学者认为:“它一开始就受到西方文化的诱导,直到现在还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对西方青年文化的模仿、跟风现象,有中国特色的青年文化还在形成之中”(李茂,2007:26-28)。也有内地学者认为,当代青少年偶像崇拜反映出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可能造成社会文化的失序(周国文,2002:26-29)。然而,笔者认为,我们不妨以谨慎的乐观预测中国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未来,一个日趋稳定和均衡的偶像崇拜模式理应带来更加积极而理性的青少年偶像崇拜文化。

参考文献:

- 何宇红,1994,《崇拜心理的历史根源及现状分析》,《湛江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
- 黄陵东,2003,《西方经典社会变迁理论及其本土启示》,《东南学术》第6期。
- 李海荣,1988,《青少年社会化与第一人格偶像崇拜》,《宁夏社会科学》,第6期。
- 李茂,2007,《新时代偶像变迁,“呕像”颠覆偶像》,《当代青年研究》第7期。
- 罗丽榕,2007,《关于转型时期我国当代青少年偶像变迁的思考》,《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9卷,第3期。
- 闵丽,2003,《当代中学生偶像崇拜的后现代特征》,《青年研究》第3期。
- 钱理群,1994,《一代学者的历史困境》,《读书》第7期;引自:周永生,1994,《当代青少年英雄崇拜移情倾向探讨——兼论“追星”现象》,《青年研究》第6期。
- 宋兴川、金盛华,2002,《多元选择——青少年偶像崇拜研究》,《青年研究》第11期。
- 孙玉石,1999,《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孔思潮之平议——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总第25期。
- 岳晓东,1999a,《青少年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的异同分析》,《青年研究》第7期。
- 岳晓东,1999b,《偶像与榜样选择的代沟差异:香港和长沙成年人的见解》,《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15期。
- 岳晓东、梁潇,2009,《青少年偶像崇拜系列综述之四:论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分型》,《青年研究》第3期。
- 岳晓东、张宙桥,2002,《青少年明星崇拜与杰出人物崇拜:香港与内地1998-2001年的研究与思考》,《青年研究学报》第10期。
- 岳晓东、严飞,2007,《青少年偶像崇拜系列综述之三:青少年偶像崇拜的代际差异》,《青年研究》第5期。
- 张大均、吴明霞,2004,《社会变革时期青少年心理问题及对策研究的理性思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2期。
- 章洁、葛进平、张芹,2006,《大众传播与青少年偶像崇拜》,《新闻实践》第11期。
- 赵春,1989,《港台及国外学者关于五四运动的若干观点》,《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
- 周国文,2002,《榜样与偶像的错位——从偶像变迁看当代都市青年的价值观》,《当代青年研究》第3期。
- 周永生,1994,《当代青少年英雄崇拜移情倾向探讨——兼论“追星”现象》,《青年研究》第6期。
- Blos, P., 1967, “The Second Individuation Process of Adolescenc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22.
- Erikson, E., 1964, “Memorandum on Identity And Negro Youth”,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64b:20.
- Erikson, E.,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 Fromm, A., 1967, *Ability to Love*. New York: Farrar, Stress, and Giroux.
- Josselson, R., 1991, *Finding Herself: Pathways to Identity Development in Women*. San Francisco, CA: Jossey - Bass Publishers.
- Marcia, J. E., 1980, “Identity in Adolescence”. In J. Adelson (Ed.), *Handbook of Adolescent Psychology*, New York: Wiley.
- Yue Xiaodong & Cheung Chau - kiu, 2000, “Selection of favourite idols and models among Chinese young people: a comparative study in Hong Kong and Nanj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No.24(1).